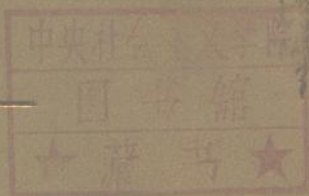




列宁 生活 片断



〔苏〕莉·亚·福齐也娃著

童树德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A733/2
D621/08

5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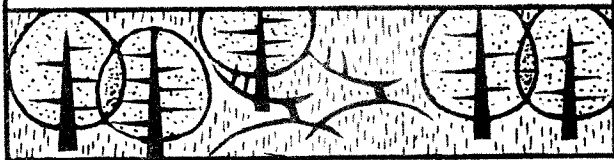
列宁生活片断

[苏] 莉·亚·福齐也娃著

童树德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

列宁生活片断

〔苏〕莉·亚·福齐也娃著

童树德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19,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2版

198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59,600

统一书号：1106·6 定价：0.82元

重 译 前 记

伟大的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战一生，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丰富的理论著述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巩固基础，指引着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人类要亿万斯年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地球上的每一块土地，也将世世代代回响着列宁的声音，浮现列宁永不泯灭的遗容。

《列宁生活片断》的作者莉迪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一九〇一年在彼得堡别斯图热夫高级女校求学，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而受到警察的监视，判处流放，坐过牢。一九〇四年，福齐也娃侨居国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日内瓦协助列宁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工作，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进行秘密通讯联系，第二年回彼得堡，投入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后又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福齐也娃曾任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并兼任列宁的秘书。

福齐也娃写了很多关于列宁的回忆录，记述了列宁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于细微处见精神。这些回忆录虽然不是列宁一生的系统传记，但又胜似传记，具体生动，读来亲切感人。作者怀着对列宁的深厚感情，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衷心爱

戴。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一些方面、一些时期的工作、生活和斗争，在福齐也娃的回忆录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回忆录先后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也出版过单行本，选编在回忆列宁的一些文集中，受到好评。同时，福齐也娃提供的这些素材（其中很多是第一手材料），对于研究列宁的生平和学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生活片断》的初译本出版于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重版。重版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的新版本，除初版中的《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晤》、《列宁是怎样工作的》、《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列宁受伤（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和《列宁永生》等五篇外，补译了新版本增加的《列宁的工作日》、《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最初几个月的工作（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八月）》、《鼓动家的列宁》和《回忆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等四篇。此次重译，除文字上的修改外，人名、地名等均统一于《列宁全集》的中译本。

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事业将与世长存，他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革命风格也将永葆青春，激励着亿万有志于改革，有志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志士仁人，在尽管还有许多困难、许多问题的征途上，进行新的热烈的追求。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盛世”。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巨大的历史灾难必将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一个多难之邦，肩负正义，酬以愚公之志，定会玉汝于成。

译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DG21 / 08

目 录

- 1 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
的会晤
- 30 列宁是怎样工作的
- 74 列宁的工作日
- 84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
公室
- 103 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最
初几个月的工作(1918年3—8月)
- 123 列宁受伤(1918年8月30日)
- 133 鼓动家的列宁
- 144 列宁永生
- 154 回忆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3月)

同列宁在日内瓦 和巴黎的会晤

一九〇四年初春，我受到七个月的监禁之后，因为“证据不足”，从彼尔姆的监狱释放出来了。和我一道在这里受到监禁的，还有我的兄弟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是被控告拥护彼尔姆社会民主党组织；随后，我又立即投入了革命工作。但是，仅只过了个把月的时间，再次被捕显然又不可避免了，于是彼尔姆的同志便协助我逃往国外。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到萨马拉去的秘密接头地点。在萨马拉，我弄到了去国境线上的小城苏瓦乌基的介绍信，这是我们越出国境的地方。

越出国境时的情形，简单得令人好笑，代价是十五个卢布。据向导告诉我，这笔钱大部分是被边防哨的头目拿去了，而在边境线上的小兵，却只能分到二十戈比的酒钱。我渡过了一条小河，可以说是只经过几分钟，就踏上了德国的领土。向导引我到一个小城果里达普，在这里，我直奔在苏瓦乌基时同志们告诉我的那个作裁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住址，在他那里过夜。第二天，我从他那里弄到了一张火车票，动身前往柏林，然后转赴日内瓦。

我并不是一到日内瓦便立即会见了弗·伊·列宁的。我按照指定的地址，到卡鲁日基大街去，在那里见到了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将他误认作是列宁，他随即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现在都还不在于日内瓦，可是他们很快便会来这里的。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很亲切地接待了我，建议我就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发行部工作，他是由中央委员会任命，领导发行部的。发行部也设在卡鲁日基大街。我在这里会见了维·米·韦利奇基娜（邦契—布鲁也维奇）、马·尼·利亚多夫和他的妻子莉·巴曼德尔施塔姆、弗·弗·伊林、勒柏辛斯基夫妇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人员。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和他们交往，我不仅感到愉快，而且还觉得很有益处，因为这种交往帮助我认清了当时政治侨居生活的各种复杂情况。

没有来日内瓦以前，我对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实质和范围，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但是，仅以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很少一些事情，就已使我们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这方面了。因此，我到日内瓦以后，与其说是根据充分的了解，倒不如说是由于本能，我的整个同情都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所以我很快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然而，只是在日内瓦这个时候，当我贪婪地阅读了党的文件，特别是阅读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

这部著作，和一些老同志交谈过情况以后，我才彻底地弄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达到了何等深刻和不可调和的程度。

孟什维克在立场上缺乏思想原则性，既决定了他们在国外政治侨居时的行动路线，也决定了他们在国内的行动路线。在一切报刊和各种会议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诽谤布尔什维克，责备列宁独裁，谩骂他企图将一切大权都独揽在党的手中，是拿破仑式的行为，简直是罪大恶极；他们总是欺骗俄国所有的党组织，破坏多数派在日内瓦召开的各种会议，歪曲会议一致同意的意见。总之，他们老是制造着永无休止的纠纷，制造着毫无意义的派性的争吵，弄得人们有时真是不能容忍。孟什维克阿谀逢迎每一个来自俄国的工作人员，竭力把他们笼络到自己方面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于不惜采取蛊惑人心的手法。

我在一九〇四年夏天到达日内瓦以后，立即便置身于这种复杂、紧张和艰难的国外侨居生活的环境中了。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回到了日内瓦。同他们的会见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质朴、通达情理都令人感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殊洞察力，真使人惊诧不已，他似乎能识透每一个人。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同各级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组织保持着秘密的通讯联系。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筹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每月收到的信件多达三百余封。她建议我协助她进行这件工作，我欣然同意了。

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起工作，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总是那么沉着、安详、亲切，对人关怀备至，随时都乐于帮助每一个同志。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具有渊博的理论和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侨居国外时，她一直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遵照他的直接指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同国内党的各个秘密组织进行艰巨而繁重的通讯联系工作。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收到从俄国寄给列宁的无数信件和通讯以后，便向他详尽地汇报我们各个秘密组织的工作情况。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得力助手，熟悉许多职业革命家，记得很多同志的名字和化名，善于正确地评价党的每个工作人员。

同俄国进行通讯联系是一件非常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它要经过几道手续：首先，应当将收到的所有信件予以分析，“复现”每一封信，解译信中的密写部分，并重抄一遍。接着，就要起草寄往俄国的回信，将最机密的部分译成密码，用化学方法，将回信正文抄写在从内容上不会引起暗探局怀疑的信件的字行之间，这种信件都是事先就用普通墨水写好了的。有时，一些来信的密码有不少错误，还得长时间地冥思苦想，才能把密码解译出来。有时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前次的信件遗失

了，或者组织被破坏，收到的信件是用看不懂的新密码写成的，要想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化学药水”写成的正文复现不出来，便只好通过“邮箱”，请求再寄一封信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同俄国的通讯联系。信件的正文一般地是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以列宁的名义起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时常亲自执笔。其余的一些技术性方面的工作，我在日内瓦时，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就和我分头去做。

对于俄国所有的党委会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些信件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这些信件以统一的方针团结和联合了各个委员会，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工作人员总是迫切地期待着这些信件，激动地阅读它。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创办了一个“邮箱”，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这种“邮箱”非常重要。它以简练的形式，仅仅只为收信人才能理解的语言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探询消息，通知对方已经收到来信或者长久未接来信，某封信的密码解译不出来，等等。在布尔什维克尚未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时（自一九〇三年十一月至一九〇四年底），“邮箱”是没有地方刊登出来的，但《前进报》问世后，几乎在每一期上都一再地刊出了“邮箱”。它们有时还占了很大篇幅。例如，在第九号的《前进报》上，“邮箱”竟占去了二十九行。现举出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十五号《前进报》刊登的

一个小“邮箱”作为例子：

娜佳：信件复现不出来，化学溶液过淡……

斯毕茨：信件上的决议复现不出来。

科里亚：您托人捎来的信和通讯地址均已收到。

弗拉基米尔：来信收到了，谢谢。

敖德萨“一个地方机关”：您的来信很有意思，望继续来信。

T—P：来信第一、二、三、四号均已收到。第二、三号各为二份。请再告收信地址。

洛利亚：汇款和信件收到否？

安东：来信收到。

F·S：第三个通讯地址很好。

反对《火星报》的作者：我们表示感谢，但不拟在报刊公布，因为每件事情都使人满意是不可能的。

C.C.Д：决议和信件均已收到。

安东尼娜：来件我们已经收到。

我每天清晨就到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家里去，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伊里奇之家”是在“达维德大街”。在一幢有两间卧室（每间各有一扇窗户）和一间厨房的简朴住宅里，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她差不多从来没有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分离过，终生都是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逝世时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

她很好，她也很疼爱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庭生活极其俭朴。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料理整个家务，买东西、做饭、收拾房间。她总是那么安详、娴静，显得有条不紊，对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关心。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也时常从工作中挤出一些时间来帮助她。她经常对我说，料理这些家务，并不使她怎么劳累，这没有什么；使她劳累的，倒是要经常牵挂着这些家务。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共住一个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着另一个房间。两个房间的陈设都很俭朴，象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一样。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铁床，上面是一个棕制绷子，还有一张不很大的桌子和两三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房间里接见从俄国来的同志，和他们谈话，而工作则在 Société de lecture（讲演协会）的社会图书馆，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一大早就去那里，午餐时回来一下，然后又去那里，直到用晚点时才回家。我记得，“伊里奇之家”是在下午四点午餐的。有时，我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就留在他们家里午餐；工作特别紧张时，还留下来用晚点。对于我来说，这些日子是特别珍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还趣逗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重婚者所受的最大惩罚，便是有两个

岳母。不论是在午餐或者是在用晚点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不谈论工作，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从不挑拣食品，好象随便什么都可以吃下去似的。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共同的精神要求、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家庭，它的那种特别和谐的气氛，使我陶醉了。

我同大多数俄国政治侨民一样，多半是在勒柏辛斯基夫妇的饭店用餐，从早到晚，这里都挤满了人。实际上，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俱乐部。同志们都到这里来聚会，交换新闻，争论问题，下棋，听报告。从俄国来的同志，首先都是到勒柏辛斯基夫妇的饭店来的。这里有一架租赁来的钢琴，晚上，我们经常都能听到谢·伊·古谢夫的一曲高歌和彼·阿·克拉西柯夫的小提琴演奏。我给他们二人伴奏，有时自己也演奏一点钢琴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常到这里来。古谢夫是一位非常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中音，音乐素养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他演唱达尔戈梅斯基、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的抒情曲，深为赞许。

在我所演奏的钢琴曲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听的是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8号之13，小调奏鸣曲《热情》）。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这首奏鸣曲后，走近我说：“您应当学习”。这句话使我大感奇怪。“真的，能够学习吗？！”我心里想道。年幼的时

候，我对皮萨列夫的作品很感兴趣，在他的作品中，我读过这样一段话：“有艺术教养的社会，哪怕只有一个文盲，也会象一个手戴金镯、赤身露体地奔走的野人”（这儿的引文全凭记忆）。这些话曾经对我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以优异成绩升入我求学的音乐学院高年级时，我休学了，转学到别斯图热夫高级女校。可是，列宁——竟是谁啊？！——却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您应当学习……。”但是我回到音乐上面来，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克拉西柯夫用小提琴演奏的一些简单曲子——布拉克的《小夜曲》和拉法的《抒情独唱曲》，非常动听。彼·阿·克拉西柯夫是在莫斯科大逮捕之后，六月底到达日内瓦的，他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有幸而逃脱出来。我见到他时，他刚出车站，和潘·尼·勒柏辛斯基走在一起，提着一个小手提箱和一把装在套子里的小提琴。一个职业革命家，才从暗探和宪兵的魔爪下逃脱出来，秘密地偷出国境，却随身携带一把小提琴，我感到很不简单。克拉西柯夫讲述了很多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趣闻（他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俄国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出生和长大成人的西伯利亚的事情。他同孟什维克论战时，总是占住上风，能够抓住他们的致命弱点予以回击，他是一个聪明而机警的人，讽刺得恰到好处。孟什维克那样仇视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党内有一个雅号，就是叫“尖针”。

有一次，克拉西柯夫建议我组织一个有三、四名同志参加的小组，教给我们按照选定的题目起草传单和布告。参加这个小组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我在基辅的一位同狱难友索尼娅·阿法纳西也娃，还有一位是日内瓦大学医学系学生、一九〇五年以后担任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秘书的瓦内亚·卡萨特金娜，再加上另外一个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打算在日内瓦长此以往地住下去，能够写出一手好的传单和布告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都乐意地接受了克拉西柯夫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学习没有继续多久，因为这是别出心裁，有点儿不切实际。

有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来到兰多尔德咖啡店，那里为俄国政治侨民备有一间小密室，有一扇单独的门通向胡同。每天晚上，我们来这里喝上一杯啤酒、尽情而谈、争论问题或者下棋。经常来兰多尔德咖啡店的只有布尔什维克，至少我在这里一个孟什维克也没有见到过。我爱同古谢夫下棋，克拉西柯夫就在一旁主演“捧场者”的角色，百般地打搅我们。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这里对弈一局。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两人，也时常在这里消磨一两个小时。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是在释放出狱后不久，一九〇五年九月中旬或者十月初抵达日内瓦的。我们认识之后，很快就结成了亲密之交，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她逝世时为止。一九〇五年，由于革命工作的关系，我时常在彼得堡同她见面。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

政府迁到莫斯科，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就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她很喜爱他，是他的亲密朋友。在这些年代里，我们每天都要见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告诉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她。天气变得不好的时候，他总要看一看她是不是穿了套鞋；假如发现她有些疲倦，就问她是不是“劳累过度”了。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庭院里，我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散步。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曾恶作剧地打过一次雪仗。这场愉快的游戏，一直玩到我快要用雪塞满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衣领才停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她，关心地拍拭掉她衣服上的雪块，使雪不要融化在她的衣领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害病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一起，寸步也没有离开过他，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一个对党无限忠诚，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的女职业革命家，她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突患重病，就此一卧不起，于六月十三日离开了人世。

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她在党内的化名叫“小狗熊”）经常骑自行车到日内瓦近郊去游玩，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和我们一起去。一天傍晚，我们三个人在城郊一条狭窄的田野小路上骑行，路的两旁尽是浅水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在前面，我跟着他，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最后。小路沿斜坡蜿蜒而下。我还只刚学会